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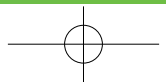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3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学术简报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北京大学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平台，是一个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智库功能三项工作为一体的建制单位。它以各院系现有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为依托，充分尊重和利用历史资源和现有条件，动员北京大学多样化的学科力量和长期积累的国内外联系，整合和盘活各院系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梯队与物质要素，充分激发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做到既面向国家需要，也面向学术的发展和未来人才的培养，拓展加深各学科的研究能力和潜力，构筑跨学科、全方位、多层次、有活力、协同合作、共同攻关的学科新布局。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将各国、各地区的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民俗、组织、制度及人类其它各种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是对包括本国在内的世界人文、社会知识及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所做的综合性研究，它的目标是构造全方位的知识体系，为世界整体与本国人民服务。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坚持基础研究的思想导向，以学术为主导，面向世界重点国家、重点地区和重大问题开展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形成中国特色、北大优势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式，为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与发展贡献力量。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工作范围包括：1) 学术研究，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志在专门、深入、有创造意义的学术成果，向社会贡献学术思想；2) 人才培养，探索新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以适应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需要，培养新型人才，使其既具备思考能力，也胜任实际工作；3) 智库功能，在研究与教学的支撑体系保障下就重大问题提供建言，为应对各种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献言献策；4) 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延展学术网络与思想网络，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果，传递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努力与国内与国外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取其所长，学其所能，并诚请同行的帮助与支持。



## 研究院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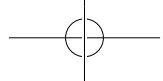
### “博雅工作坊”第二工作间 中国与周边：趋势和机遇 2018年4月12日

2018年4月12日下午两点，博雅工作坊第二工作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305会议室召开。第二工作间聚焦“中国与周边：趋势与机遇”，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沈志华主持。马戎、韩东育、王浩、张辉、段晴和翟崑教授分别做了主旨发言。

第一个发言人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马戎教授，他发表了主题为“加强对周边国家历史和社会现状的调查研究”的演讲。马戎教授从他自身的社会学调查讲起，谈到他在边疆地区的工作和调研经历。马老师最突出的感受是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不可能不去考虑历史上对外的影响或者是近代的影响。他虽然去了很多国家和地区，了解到许多国内的学者，包括政治部门的、外交部门的学者，对于国外情况了解非常有限。

马戎老师以北大印地语学生为例，再次点出了这些不足之处。从印地语来说，国内绝对需要，但是事实上受限于学生的个人追求以及当地的生活条件，很多学习印地语的学生不愿意出国，因此对于国外的情况并不了解。虽然在学习印地语，但并不真正地了解印度。例如，当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的时候，找了王邦维老师和社会学系的老师，但找不到真正懂印度的人。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马老师谈到很多大使馆的人员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现在很多使馆人员不愿意出国，出国也不像80年代那么诱惑，出去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赶快



找当地的华人教授联系子女亲属出国留学，马老师发现中国的外交官的状态不容乐观。他了解到哈萨克斯坦的使馆人员，大多只会说俄语，但是想要了解当地的社会只能俄语不会说哈萨克斯坦当地语言是不够的。相反，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的外交官每次出行都带着很多的任务，他们十分敬业，将对象国的人口、社会、政党、宗教、法律调查得一清二楚。

马戎教授提出，现在要走出国门向世界介绍中国，使“一带一路”工作顺利开展，一定需要语言人才，以及大量调研工作，要把当地的情况了解透彻。他举了殖民地的例子，例如东南亚除了泰国，大多数都是过去的殖民地。现在虽然官方语言是殖民者的语言，但是真正基层的社区、法律、社会文化还是当地语言而不是英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交人员不熟悉当地语言根本无法进行深入调查与研究。又如英国从海军部拿到大量的资助，派地理学家到当地，详细调查研究了当地的语言、宗教、社会、法律、伦理、地方等等方面，为他们因地制宜来制订当地有效的殖民统治的方法奠定了一个知识基础。但是，现在很多中国企业贸然出国，不熟悉对象国国情，不了解当地法律、风俗民情，也不了解当地的社会矛盾，部落冲突，贸然地认为与政府机关处理好关系就可以，结果只能吃亏，面临巨大投资风险。马老师认为现在对于对象国的知识太缺乏，人才储备不足、知识储备不够，仍然需要面对巨大的工作量。这是马戎老师的第一个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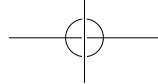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马戎老师提出需要结合外语学院以及各个学院提出一个送出留学生的长远的计划，分国别、分地区、分语种、分层次，有一个多年的积累才能够将某个国家研究透彻，比如肯尼亚、缅甸。想要打好基础，需要利用留学生来进行了解。这些送出去的学生不仅仅学语言，还要了解学习对象国的社会、观察对象国的社会、经济、理解对象国的法律和对象过的伦理、交往之道。

通过留学生多年的留学经历和研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知识储备。与此同时，需要通过这些留学生想办法建立一些联系，这些留学生回国工作，再与原来的国外的老师合作，合作一些课题，就能够帮助我们逐步积累起对于对象国的历史、地理、自然资源、政治、经济、法律等知识，慢慢将对于对象国的知识巩固起来。

另外，马老师提到，外国留学生的作用也非常重要。第一与留学生合作可以加深对这个国家的社会和人的思维方法的了解。第二这些留学生在中国接受教育，接受中国老师的关怀和学校的教学系统，会培养出对中国的感情。留学生回国后对中国一定程度的认同，比如第二故乡的认同感，这对于我国将来各方面的发展非常重要。马老师提到这两、三年以来他不断地收到巴基斯坦学生的申请。为了推进“一带一路”，我们国家提出中巴经济走廊，因此中国外交部为巴基斯坦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奖学金，但是巴基斯坦的学生必须要拿到国内大学的接收函，才能够符合要求，所以很多巴基斯坦学生希望来到中国学习。

然而，马老师同时指出，接受留学生，对于老师并不轻松。第一是语言的问题，交流并不是那么顺利。第二留学生很少研究中国的题目。老师为了知道留学生的课题是不是符合情况，是不是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老师要了解这个题目和这个国家，做很多预备工作。同时用外语指导论文也并不轻松。因此如果学校没有任何鼓励措施，老师们做这件事的意愿就不会很大。马老师提到，现在国家缺乏这方面的鼓励政策，在政策的配套上做得并不好，因此出现了断层的问题。这些项目并没有按照理想的方向进行下去。他认为，国家、学校需要在这方面给出一定的支持，才能很好地实现对于留学生的培养。

演讲的最后，马戎老师谈到了跨境民族问题。他认为我们国家的边界不是自然形成的，1840年之后的各项条约



框定了我们国家的国界，因此必然存在很多传统的部落或者族群会跨国居住。马老师引用了他前年在《开放时代》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如何看待跨界民族的概念》，提出不赞成“跨境民族”这个概念，中国没有部落、族群的概念，没有 Nation 的概念。Chinese nation，就是全体中国人，因此马老师也不赞成在中国内部再说 56 个民族，我认为应该叫 56 个族群，并且边界可以移动。仍然使用跨境民族会带来很多问题，这样不但引不起正面的作用，引起对方官方学界的反弹，同时也给国内造成混乱。因此马老师认为，可以将这些人称为“跨境族群”，但在美国拿了美国公民权的华人不可以认为是中华民族成员，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员，应以国籍论，不是以文化来论，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将疆域弄清楚。讨论的时候术语上要慎用跨境民族这一概念。

第二个发言人是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他发言的主题为“‘学术戍边’的理论与实践”。韩老师首先提到，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回到了中国古人的感觉里，现在中国要做大国，就要向古人学习。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不仅仅涉及中国区域内的学问，对于周边也都有广泛的涉猎。韩老师强调，现在中国想要真正回到世界舞台中心，必须要向古人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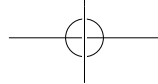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对于马戎老师在上文提到的疆域问题，韩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古人有两个疆域，一个是文化疆域、一个是地理疆域。这两个疆域的表达方式在秦始皇之前，是文化加疆土的混合，例如那时候对于最高领导人就一个称呼，最高领导人叫天子，后来秦始皇突然发现这样并不符合现实。比如君主被称作皇帝，但外国人只认天子不认皇帝，这时对于君主的称呼就发生了转变，皇帝一定要带上天子，因为还有域外的问题。过去的疆域是文化

疆域加地理疆域，但是到了近代以来只承认地理疆域，不承认文化疆域。目前的情况，一个小小的地方就可以动起手来，这样的一些思想非常分明。

韩老师提出，我国疆域形势现在变得非常的严峻，我们必须正视这个情况，必须按照国际法处理我们的周边事务，这就有了边疆地区学者该如何对待目前中国处在险象环生状态里面的基本的责任担当。韩老师以东北的东亚研究团队为例，认为这些边疆地区的研究机构有着地缘优势，对于邻国的状况有直觉。但也有不小的劣势，劣势是看问题比较局限。

对于如何通过学术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边疆的问题，韩老师和他的团队凝结出一个概念叫做“学术戍边”。这个概念以前还没有人正式提过，但是思想早就有了，为此韩老师撰写出一个稿子“学术戍边”的理论与实践。韩老师提到，“学术戍边”是指从事国家边疆周边邻国和区域关系的研究人员及其相关工作者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区域安全而自觉承载起来的学术责任和职能担当。国务院学科组、历史组曾经对中国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做过调研，发现现行所谓的世界史研究更多的是区域国别史，其实还有区域里面的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比如说东北地区，我们对准的是日本、朝鲜、俄罗斯、远东，西南地区对准东南亚史和南亚史研究，西北是对准中亚史和中东史等等。这种地域差是因为国家大。因此对于边疆地区的研究机构、大学应该勇于担当起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韩老师强调，没有什么时候像今天（除战争年代以外）中国周边的关系这么险恶、这么险象环生，我们几乎没有和一个邻国的国家关系比较好。

韩老师提到，“学术戍边”不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对自己家乡的一个深沉的爱。韩老师引用了孔子和子贡的例子，他认为爱国情怀并没有妨碍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追



求更高的理想，即大统。所以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应该是一个车子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乔治·奥威尔——一个反对任何战争的人——也曾在英国敦刻尔克战役失利以后承认，我内心深处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要跟纳粹作战。韩老师旁征博引，举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写作目的的例子，还有丘吉尔等来说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学术戍边”的关系。

韩教授提到，中国古代人这种传统很多，爱自己的国家未免不是天下主义的，像班超投笔从戎，高适、王维这些边塞诗人等都积极投身于西北边疆的捍卫。他谈到，当年中国面临周边国蚕食中国的时候，西北地区交给了学者，疆域得以保住。然而，东亚地区交给了官僚，却一个个地失去。

韩老师特别提出了关于宋教仁的间岛问题。他提到当年朝鲜被吞并之后，日本人就利用这个机会想对中国东北下手，于是把现在的延边地区说成是朝鲜的。当时宋教仁到东北三省是为了进行革命，意外发现日本人要干这个事，于是就开始认真研究，写了六万字的文章叫《间岛问题》。他是个学者，是一个宪政学者，当然也是革命家，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是高级学者。之后宋教仁又到高丽、到辽东、到日本各个地方查完之后，尤其是利用朝鲜文献《通文馆志》和《东国通志》、《增补文献备考》，还有中国康熙五十一年跨境边境的事实结合到一起做出了大量的研究。拿到这些研究成果后中国在谈判的时候立于不败之地。韩老师特别强调，当时宋教仁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我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也。

韩老师通过宋教仁的例子指出，现在成立智库，是发自内心的良知，是天的命令、是一个内在道德的命令，不是迎合他人或是迎合需要，也不是为了赚“几文钱”。然而现在形势不容乐观，很多时候研究的题目是他人圈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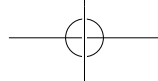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的，填一个表便拿上一些钱，这不叫做学问，这不是对国家的担当。

“学术戍边”在历史上还有很多的例子，韩老师提到，这是跟中国的哲学有关的。中国的哲学是“1”，这个概念在国疆大一统的面前已经凝结为不需讨论的哲学。这是一个不能研究的前提，因为中国经历过“道术将为天下裂”，经历过诸子百家时代，列国纷争时代。中国的“1”在不能研究之后，韩老师强调中国到了关键时刻学者必须站出来。虽然现在经常使用理科的方法管理文科，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在下降。但韩老师相信，遇到困难，知识分子一定会重新站起来。

韩老师在演讲的最后表达了自己对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期待，同时希望大家都能加入到“学术戍边”的行列中，激起作为学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我国国际形势险恶的时候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个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副主任王浩教授，他的题目为“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研究——以中蒙关系研究为例”。王老师通过这次发言，分享这些年研究中蒙关系的心得体会，并且将这些年北大蒙古中心在研究中蒙关系方面的一些体会提供给老师们参考，也为其他研究中心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考的余地。王老师谈到中蒙关系这些年发展的特别快，所以国家对中蒙关系研究也有重视，研究中心近十年承担了近十项国家课题省部委的课题，还有委托项目。

然而，王老师指出中蒙关系是有两面性的，它并不是报纸媒体中的样子，一方面2014年习近平出访蒙古，而后中蒙走廊呼声比较高。另一方面在社会下层实际上是民心疏离，互相了解和沟通是十分不够的。



蒙古中心做这些课题时感到中蒙关系根基非常不牢靠，总是反反复复，禁不起一点风吹浪打。虽然现在中蒙之间有一些合作项目，但中蒙之间的联系没有新的拓宽。因此中蒙关系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同时，现在国内在蒙古研究领域没有有实力和规模的团队。60年代在内蒙古大学有一个周边关系研究所，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是蒙古社会转型之后，周边关系研究所出现了研究人员的断层。90年代国内成立了中国蒙古国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最初还可以把北大、军方等等各方面的研究力量整合一下，但是到2000年左右，资金各方面出现了不小的问题，也无疾而终。所以整个国内，边疆、蒙古的研究虽然有很多的课题，但是没有取得有价值的成果，也没有研究成果问世。现在国内研究蒙古的人员很匮乏。从成果上来看，90年代以后边贸是很多的，还有矿产开发也比较多，这些成果比较多，还有蒙古国的外交、第三邻国这些比较热点的研究成果多。但王老师指出，这些学术成果的学术份量、含金量都比较低。实际上真正需要关注的，例如蒙古独立这类非常敏感的研究是很少的。1949年中蒙建交，1989年中蒙正常化，这些方面的研究就更是少之又少，从研究成果这些方面仍然比较困难。

王老师提到了蒙古中心正在翻译蒙古的档案，但是由于人员不足，很多只能依靠已经毕业的学生帮忙翻译。这些档案涉及当时的国家间的对话还有蒙古与周边国家交往的档案，档案中可研究的地方非常多，非常有价值。王老师强调，研究蒙古问题，只着眼于蒙古，则无法将中蒙关系看透，中蒙关系中包含了俄罗斯、美国等国的多重因素。例如蒙古铁路修宽轨、窄轨的问题，2014年蒙古议会通过北面修宽轨，南面修窄轨的决议，以及一段200公里的标准轨。很多人讨论为什么是这样，其实由于历史原因蒙古对自己的铁路只有50%的铁路权，剩下50%是俄国人的，蒙古并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铁路。这些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中蒙经济走廊也是一样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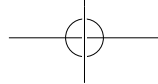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针对这些问题，王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她说，教育部对备案中心下达课题任务，一个现实研究课题、一个基础研究课题，但更好的方式是允许中心能够自命题。蒙古中心有不少的资料，足够做出有积累的、长期时间的学术研究，选择命题会比较被动，时间也略显不足。王老师强调，如果这些长期研究有了结果，交给外交部门，外交部门在做决策时就可以对历史过程有所了解。

王老师还从教学的角度、人才培养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她希望新成立的区域国别研究院能够给学生足够多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更多的国际视野的培养。王老师举了有报道称金正恩与特朗普有可能在乌兰巴托举行会晤的例子，表示很多人不理解，但是从历史上可以看出端倪，在资料档案中可以搜索到蛛丝马迹。现在的情况下学生、外交人员并不了解这些，因此需要更多的人才投入和培养，才能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王老师认为，外院在二级就可以多进行这方面的培养。同时可以开展朝蒙研究、蒙俄研究、蒙日研究，手头有资料就可以研究。

演讲的最后王老师谈到了对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展望，并且认为外国语学院在这些方面还是存在一定优势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以“‘一带一路’：经济理论范式研究”为题做了演讲。

张教授回顾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形成、发展的历程。首先是为什么？张教授提到了三点。第一、通过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60年以来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全球经济发展经历了1975年以前的快速发展（平均增速2.0%）、1975-1989年的缓慢增长（平均增速为1.1%）、1990-2007年的爆发式增长



(2.2%)以及2008年以后的增长滞缓(-0.2%)四个阶段。2008年到今天,情况比1975到1989年那个阶段还要困难,因此要拿出对策来。第二、该战略是亚洲在全球经济所占份额快速上升的内在诉求,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亚洲1970年占全球GDP为17.03%,2012年则占31.10%,超过欧洲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洲;第三、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两极分化,从基尼系数看,后20%在下降,前20%当中只有5%的人收入快速上升。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经济上的问题在政治方面有表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加在深,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矛盾也在加深

第二是时机选择的问题。张教授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两个方面说明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的极大飞跃,经济结构上也有很大改观。中国渐渐成为雁头。张老师强调,1990年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很低,跟我们相关的国家无论是中间品、最终消费品大概只有十来个,但是到了2013年,我国作为进口中间品占这些国家和地区前五位的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是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经济地位正在显著提高。

第三是内在经济发展范式的问题。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居中,我们向发达经济体出口中间品,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中间品,然后从发达经济体进口最终消费品,向发展中经济体出口最终消费品。联合国驻华代表提出:中国是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桥梁。世界上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格局,中国已将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紧密地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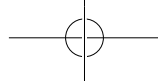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第四是空间选择问题。张老师谈到,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避免不了需要寻找自己紧密的经济合作区,英国有、法国有、德国有,中国也处在这样一个大循环体系中。六大走廊涉及国家和地区67个,研究经济发展高度,结果显

示中国居中,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水平比我们高,一半的国家比我们低。这个“高”和前面提到的数据吻合,世界是一个“8”字,中国居中,下面是一个圈圈是发达经济体、上面一个圈圈是发展中经济体,相当于阿拉伯数字“8”字,是一个大循环体系。在“一带一路”沿线是小“8”字,中国也是居中,上面也是一环、下面也是一环,是这么一个体系。所以我们讲现在世界上的经济形势,理论范式是一个双“8”字,整体是大“8”字,套着沿线小“8”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出现了一样的情况。经济数据显示沿线国家与中国合作是有好处的,合作可以将沿线国家带到中国的位置。

第五是如何推进的问题。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前四十年,8%的概率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未来中国有60%以上的概率。因此我们可以拿出一定的时间来谈公平,效率可以降低,可以做很多的事。“一带一路”沿线可以做很多的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可以合作很多东西。

然而,张老师强调,“一带一路”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人才不多,第二是没有经验。大航海时代之后中国闭关锁国了,近五百年中国在国际上的经验少一点,从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开始,到今年只有四个年头,所以整体还是弱一点。

最后,张老师谈到中国何时全方位超越美国的问题。张老师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对比英美两国的情况,美国制造业大概是1874年超过英国,1894年GDP超过英国,但它从英国手上拿到世界霸权大概是雅尔塔协议之后。英美交权是和平的,中美的交权也可以是和平的,英美交权其实是美国对英国做了很多利益的让渡,我们也可以。



下半场的主持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

第一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段晴，发言的主题是“加强西域研究将重新书写人类的文明史”。段晴教授为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梵巴语专业教研室主任、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印度传统梵语语法、中古伊朗语言、梵汉佛经对比研究等，承担有“原民族宫藏梵文贝叶经研究”、“基于梵汉对勘的佛教汉语词汇研究”、“于阗佛教史”、“《梵汉辞典》编撰项目”等多个项目，多部著作均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段晴教授一开场就将今天要作的学术报告的大纲列了出来：首先是回顾一年以来，即2016年底至今，她和她的团队一起进行的三件工作，然后再展望未来。

去年一年以来，段晴教授和她的团队主要在关注三件事：一是准备出版《于阗语无量净光大陀罗尼经》，二是持续关注研究洛浦县博物馆馆藏的氍毹，三是在泰国建立了梵经合作翻译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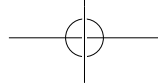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在汇报成果之前，段晴教授首先表达了对于北大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这一举措的支持。段晴教授说，她比较赞同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概念而不是边疆研究的概念，因为“边疆”是中原固步自封的概念，是要丢地盘的概念，北大没有去搞边疆研究，而是做区域与国别研究，这就方便了从一个区域的点辐射开来看其他区域。

接着，段晴教授讲述她和团队所关注的第一件事：准备出版《于阗语无量净光大陀罗尼经》。段晴教授首先讲

述了《于阗语无量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历史。这是一卷很长的经文，用于阗语写成。公元700-702年间，武则天从于阗王国请来高僧，将这部经书带了过来，并且在长安翻译成了汉语，后来这部经书又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地震后，韩国庆州佛国寺的释迦牟尼塔倒塌了，人们在里面发现了这部经书的汉文版本，而且是雕版印刷的，当时是一项重大的发现。而此前还从未发现过这部经书于阗语的全本，这次是首次公布。这份全本的出现，对于于阗语这门语言本身的研究，以及对于于阗王国佛教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通过这份全本可以看到这部经书是如何被带到长安和在长安被翻译成汉文的，能够清晰地看到文明的脉络一直在流传。

段晴教授和她的团队去年所关注的第二件事是洛浦县博物馆馆藏的氍毹。段晴教授首先向大家解释了什么是氍毹，以及氍毹的特点。在巴利语里面，氍毹的解释就是“A rug with long hair”，它是一种有着U型扣的毯毛很长的绘有图案的毛毯，制作的时候两毯合一毯，因此非常柔软。段晴教授接着介绍她的团队对洛浦县博物馆馆藏的五幅氍毹研究得到的结论。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帮助下，可以确定这几幅氍毹制作于公元四百至五百年间，是属于斯基泰人的。判断依据有两个：一个是上面有格里芬图案，另一个是上面绘有和希腊神话有关的情节。而研究已经发现，斯基泰人和格里芬图案以及希腊神话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基本可以断定这几幅氍毹和斯基泰人有关。段晴教授还用投影给大家展示了她所研究的一幅氍毹，上面绘有希腊神话中关于火与铁匠之神赫菲斯托斯、爱与美之女神阿芙洛狄忒和战神阿瑞斯三者之间的故事。不过其实一开始吸引了段晴教授注意力的并不是这些图案，而是在这幅氍毹上面的三个字母。那三个字母其实是希腊字和于阗字的结合，而这个于阗字又是从梵文演化过来的，所以这三个字所组成的复合词就代表了三种语言。当时在破译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正是段晴教授将它破译了出来，用的是语言学的一个很基本的原理，这就是语言学的作用。此外，这幅甗甗上最重要的是绘有苏美尔神话中的黑夜女神伊娜娜。英国博物馆在庆祝建馆 250 周年的时候花了一千五百万英镑购买了一尊据称是两河流域苏美尔神话里面的黑夜女神的雕塑，但是段晴教授指出，这尊雕塑其实是个赝品，原因就在于这尊雕塑的穿着和手上拿着的物品都和已经发掘出来的苏美尔泥板上记叙的伊娜娜女神不一样。段晴教授指出，她所研究的这幅甗甗上的神像才是真正的伊娜娜女神。段晴教授用投影向大家介绍了甗甗上伊娜娜女神的穿着以及手上拿着的丈量绳和丈量杖，这些都和发掘出来的苏美尔泥板上的描述完全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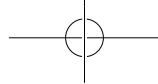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第三件事就是在泰国建立了梵经合作翻译基地，并且早在 2012 年就已经完成并出版了《长部》，目前则已经合作翻译完成了《中部》。段晴教授和团队在这个基地里有专门的办公室，每年都会带学生过去，去年还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在成立这个基地的时候段晴教授和她的团队用的是社会的赞助，完全没有用北大的钱，但是经费目前也已经捉襟见肘了。因此，段晴教授指出，现在社会上有人认为文科研究不需要经费，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像以上说的这些研究，和当地的学者联络、带着学生到当地去调研、建立基地等等都需要钱，所以目前文科也急需加大经费投入。

最后段晴教授还指出了研究的紧迫性，她多次使用了“时不我待”一词。不仅是时代和形势不等人，老一辈的学者们也已经岁数不小了，他们有知识，也知道如何进行研究，如何培养学生，如果因为经费没有跟上导致研究不能进行，那将是巨大的损失。因此经费投入和将研究提上日程是当前最为迫切的。

第二位发言的是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的翟崑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中国与东南亚，实践发展与学术研究”。翟崑教授曾担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2011 - 2014），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2008 - 2011），长期从事全球、周边地区及国别（尤其是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的综合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东南亚、亚太问题，世界政治和国际战略问题等。

翟崑教授首先说明自己是做现状研究的，主要是研究新的、活的、变的东西，比较偏实用，主要服务于现实。现状研究主要的方法是长期观察、实际调研以及沟通交流。首先是长期观察。例如，现状研究的学者要研究一个国家的话，不连续研究上五年、十年甚至是十五年是不能叫专家的。翟崑教授用自己作为例子，他在研究柬埔寨的时候，连续跟踪研究了两个政治周期之后，对这个国家才有了一定的了解；再跟了一轮政治周期之后又有了一定的了解，一辈子跟个五、六轮才能成为真正的专家。其次是实际调研，要到当地去看，去调研，要看最新的发展，也要看历史，这些都是贯通的。最后是沟通交流，尤其要重视跟官方的交流，而跟官方的交流是北大不擅长的，因为北大通常认为做学术就应该跟官方拉开距离。但是做现实研究的学者通常要跟官方贴得特别近，这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想要知道政策实行到了哪一步，第二个是希望能够协助官方少犯错误，因为制定政策是比较难的，特别容易犯错误。

翟崑教授从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出发，指出现状研究就是要求学者将观察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的经验、见识、智慧和办法。在翟崑教授看来，现状研究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很有用，这个不言而喻。第二个特点是它很艰苦，而且会让人心力交瘁。比如说做历史研究只需要将历史倒着往回看就可以了，而做现状研究则是立足于当下，一天一天地研究，但凡少研究了一天就会觉得这个历史好



像缺了一个环节，这是异常艰苦的，会让人很焦虑。第三个特点是它很危险，很容易出错。做现状研究的学者们从年轻时就开始接受这方面的训练和熏陶，如果没有足够的见识的话就会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它很危险。一旦判断出了错，这个危险不只是对国家有害，对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害，其实对研究者本人也有伤害，会感到很痛苦，很愧疚。第四个特点则是很心虚，因为做现状研究的学者天天要研究现状，有的时候做判断会比较心虚。如果能够更多地接触历史、接触理论之后再去做判断，或许正确率就会得到提升。说到这里，翟崑教授说，自从他进入北京大学工作之后，他发现在自己的同龄人之中已经有老师将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打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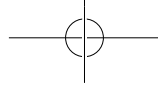
翟崑教授说，他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关于东南亚实践的发展和与研究的需求，因为他观察到最近几年，尤其是最近五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或者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对东南亚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特别需要学者们对东南亚进行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但是这个跨学科的体系目前显然还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没法给现状研究和政策研究以足够的智力支持，这是翟崑教授他特别想做的事情，但是也遇到了和段晴教授说到的同样问题——经费问题，他就不再重复说明了。

翟崑教授接着表示，他主要是从五个方面看哪些方面需要跨学科的支持。第一个方面是战略协同的问题。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从属于“一带一路”；另外一个就是我国对东南亚本身的战略。而后者是有连续性的，“一带一路”战略出台以后要怎么去跟它协同起来？顶层战略设计、南海战略设计和次级战略设计这些都需要妥善地协同，都需要战略方面的人才来做战略研究。但是做战略研究的时候非常需要将基本事实说对，因为一旦基本事实说不对，战略就空了。

第二个方面是政策协调。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政策协调主要是中央的、部委之间的、中央和地方的、地方之间的这四种模式。这四种模式一直在变化，过去在变化，“两会”之后变化更大了。如三月份“两会”结束之后，翟崑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这轮“一带一路”政策要经过新的调整，因为党政机关调整了，因此这些政策都要作对应的调整，都要和现在的东南亚政策对接。还有地方之间的协调。我国传统上是东南西北式的区域发展，但是“一带一路”的出现正在打破原有区域协调发展的模式。例如“南向通道”，是从重庆到南宁建立一个通道，一直通到海上。沿着这个“南向通道”，贵州、甘肃、广西几省签订了一个互通协定，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区域合作体系，这就需要新的理论支撑。翟崑教授认为这方面特别需要国内的专家的支持，尤其是像张辉教授这样的专家的支持。

第三个方面是项目管理。这些政策的制定最终都是以项目的形式出现的，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有新增的也有存量的，有创新型的也有基本型的，有公益型的也有营利型的，这就牵涉到项目管理的问题。项目管理背后是一个风险的问题，但是如果在这方面不懂经济、不懂金融、不懂风险管理的话就没有话语权了，因此也需要相关方面的专家支持。

第四个方面是民生问题。政策的制定是要惠及民众的，要惠及国内的民众也要惠及国外的民众，民生问题要和企业和政府挂钩。举例来说，在开拓东南亚市场方面出现了新变化，过去十年主要是中国政府搭台企业往前铺，主要是央企、国企，但是现在民间企业也走出去了，如华为、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有可能塑造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链、供应链形成之后又会带动官方重新去思考政策。这就是新变化，如果不去跟踪研究，没有新的理论支撑的话也做不到制定新的政策。



最后一个方面是软件层面。如舆论、技术支持、专业评估。要衡量中国对东南亚做得好不好，其中一些标准就是对当地政府有没有帮助，生态环保有没有破坏，提高多少就业率，民俗习惯有没有颠覆掉。这就需要提出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因此也需要学术界的研究和支持。

翟崑教授最后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东南亚的发展，我国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新的现象，目前不是某个专业研究所可以应付得来的，它特别需要跨学科的框架，要集中精力。而这种问题在其他区域也都是是一样的，因此他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有助于打通这些壁垒，这是非常有益的。

在自由讨论发言环节，来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的王旭教授用了三个例子来说明他对现在跨学科研究的感受，以及说明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的重大意义。

王旭教授首先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说明以前在承担教育部、外交部部委的课题的时候，北大南亚系和南亚研究中心做田野调查主要是以访谈的形式进行。但是这样的方法有一个缺点，就是缺乏定量的科学分析，导致有的时候会得出比较奇怪的结论，所以有的时候对于当地反而会造成冲击或者是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南亚系和南亚研究中心需要利用社会学系的调研方法，更多时候会先让学生到社会学系去学习方法论，然后在社会学的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行调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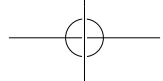
第二个例子，王旭教授还是以南亚研究中心在过去两年里做的一些国家课题为例，指出这些课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跨学科。例如，其中有一个课题和边界问题有关，这就需要外国语学院和历史学系的老师们合作来做。

在这个过程中外国语学院的萨尔吉老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而历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也帮忙查阅了很多文献档案。而且在完成这个报告的过程中王旭教授还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考虑了问题。所以现在做课题，亟需一个跨学科的交流平台，亟需跨学科之间的合作。

王旭教授举的第三个例子是南亚伊斯兰教的研究，指出如果只研究中亚地区的话，就很难理解现在苏菲教团在南亚地区的传承情况。这种研究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是一种跨领域的研究。王旭教授还举了罗辛亚人的例子，说明现在很多研究都需要跨区域的研究。但是不同领域的学科之间、研究不同区域的学科之间原本是有界限的，所以如今成立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就能够很好地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戎教授补充说，他建议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首先要做出一些成果来，而且要是“漂亮活”，将问题研究深入、研究透，将自己的声誉打响。因为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现在还比较弱，人才也比较欠缺，所以马戎教授建议先做一两个方面的研究，建立几个课题组，将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历史学系、经济学系等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包括进来，从不同的角度利用各个学科的专长和方法把某个国家的基本情况研究清楚。马戎教授指出，这些研究现在在中国是有着巨大需求的，对于国家政策的实施、“一带一路”的政策实施将会有很好的支持作用，国家肯定是会支持的，但是我们首先得把这些研究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做出来，将自己的声誉打响。

段晴教授则补充指出要注意安全的问题，无论在哪个国家进行调查研究都要注意安全形势。此外，段晴教授还建议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如果要研究的话就要研究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普及性的项目，不要像文化公司做的那种普及的项目，而是有专家团队参与的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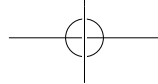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接下来是宁琦教授，她补充说明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的过程。其实在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早在2009年，当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也就是北京大学现在的林建华校长就已经有了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想法。当时林建华校长访问了许多国家，发现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不够充分，因此就想在北大成立一个专门针对区域与国别进行研究的机构，而且也已经做了许多论证。遗憾的是，这个想法因为林建华校长调任重庆大学以及后来调任浙江大学而未能付诸实践。而等到2015年林建华校长回到北大的时候，“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是如火如荼了，因此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事情迫在眉睫。此外，北京大学对于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这件事有着先天的优势。因为北京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有着许多优秀的学科，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还有自然学科和工科。这些学科都有内在的动力去了解“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以及中国在未来世界上的作用，也都很愿意投身到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建设中来。因此，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成立是学科建设所迫切需要的，再拖下去的话就真的是时不我待了。

同时，宁琦教授也对段晴教授和翟崑教授提到的经费问题进行了回应，说明学校对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和“临床医学+X”是目前北京大学提出的两个重要平台，目的是想要将北大所有的学科资源整合起来，不仅仅是几个团队的整合，还包括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等等。北京大学确实是想把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作为一个调整全校学科来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因此在经费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既有双一流建设的可观经费投入，还可以用捐赠或者是专项经费的形式募集社会上的资金。宁琦教授指出，重点是要先研究出成果来，填补学术界上期盼已久的空白。宁琦教授还承诺会将段晴教授和翟崑教授提到的问题原原本本地向林建华校长汇报，对学校负责。

此外，宁琦教授还说明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会采用“虚体实做”的架构，即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会采用各种灵活的方式聘用老师，如实行双聘制。而且不仅仅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学者，还包括全国甚至全世界认同北大的这个理念的学者，都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交流和研究。宁琦教授最后指出，北京大学现在真的是在下决心做这件事情，而且也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向前推进下去。

接着发言的是沈志华教授。他首先赞扬了北京大学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这件事情，指出北京大学做这件事情是很有优势的，因为北京大学名气大，学科基础好，号召力也强。接下来他对于如何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建设起来提了两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得跟政府相关部门沟通。沈志华教授根据自身在进行档案收集工作过程中的经验，指出政府其实是需要学术界的支持的，只是缺乏一个平台、一个渠道让政府和学术界进行沟通，结果导致政府不知道学术界了解什么，学术界也不知道政府需要什么。沈志华教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苏联88旅纪念碑的命名问题。当时俄方认为应该按以前苏联官方的名称“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步兵旅”命名，而我国认为应该按我国的名称“抗日联军教导团”命名，两方就为这件事争了一年都争不下来。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李辉大使和沈志华教授见面的时候谈到了这件事，沈志华教授回去就将自己找到的档案发给了李辉大使，实际上两方面都对，因为一开始中方确实是将这支部队命名为“抗日联军教导团”，但是到了苏联之后斯大林将它扩编成了旅，又给了一个新的番号叫做“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步兵旅”，所以两种叫法都对，都是有资料可查的。于是这件事就定了下来，李辉大使当时十分高兴。这就说明了有时候政府也需要学术界的的支持。



而学术界需要政府的支持这方面，沈志华教授也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去海参崴想要借阅俄方的档案，一开始的时候十分不受俄方接待。后来跟我国的总领事馆一说，开了一个照会，再去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档案随便看，水果、点心等也都摆上了。所以有的时候学者想要到国外查找资料，要是能够有政府官方的支持，那将会方便许多。从这方面看，北京大学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这个平台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除此之外，沈志华教授指出，要认识世界、认识别的话，最好是要在当地有一个工作站。因为我国现在的大使馆对于学术这方面的支持还不够，很多时候学者去国外搜集资料得不到使馆的帮助，因此最好能够在当地建立起自己的工作站，平时搜集资料，学者到了当地可以直接去这个工作站查阅，这是极其方便的。沈志华教授说：“中国要想走出去，学术先得走出去。学术是什么？学术是沟通舆论和政府的桥梁，一个中间环节，所以我们能利用这个平台（指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跟有关方面联络联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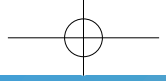
说到这里，马戎教授表示同意，他建议这方面可以跟外交部谈一个合作的项目，因为外交部也有需求，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沈志华教授接着提出了第二个建议，建议北大要想建立这个平台的话，就要集合全国的学术力量。因为这件事情一方面是比较“新”，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它确实涉及到了方方面面，既不是一个学科也不是一个学校就可以做成的。而如果能够调动全国的高校、学术界一起合作起来，既能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又能让在某方面有优势的学者或者高校发挥这方面的作用，那么最后大家就能够互相享受成果。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一个比较好的平台的话，就能够将各方的优势调动起来，所以沈志华教授也希望北京大学好好思考这个建议。宁琦教授立即承诺会将沈志华教授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转达给领导。

之后，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荣新江教授也补充发言称，经费投入不会是个问题，关键是要说明这些经费怎么用。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得有一个课题，而且还必须是在区域与国别研究框架下的课题。因此，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目前最重要的是两点，一个是选好课题，另一个是用好经费。

在会议的最后，沈志华教授总结指出，正如之前段晴教授说的，现在真的是时不我待，需要马上行动起来。北京大学要是把这个平台筑了起来的话，八方都将会不断有学者加入，因为这将会给学术界带来极大的好处，沈志华教授说他对此是极有信心的。

至此，第二工作坊的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记录：乔蕊

整理：何俊德、关子宁

审稿：咎涛

